

DEEPAK LAL

迪帕克·拉尔／著

史军 译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复活看不见的手

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

Adam Smith

DEEPAK LAL

迪帕克·拉尔／著

史军 译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复活看不见的手

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看不见的手：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 / (美) 拉尔 (Lal, D.) 著；
史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

书名原文：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ISBN 978-7-5447-2594-1

I. ①复… II. ①拉… ②史… III. ①市场经济学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021 号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Case for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Deepak Lal

Copyright © 2006 by Deepak La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414号

书 名 复活看不见的手：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
作 者 [美国] 迪帕克·拉尔
译 者 史 军
责任编辑 陈 锐
原文出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94-1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5

“资本主义”的起源 / 5

全球化 / 13

第 1 章 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 22

重商主义 / 25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 27

英国领导下的和平与经济发展 / 38

第一个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终结 / 42

再造一个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 47

第 2 章 从“自由放任”到“干预教条” / 54

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 / 54

19 世纪英国的贫困与工业化 / 58

“来自天堂的恩赐”:分配主义 / 60

竞争与垄断 / 62

“内嵌式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 / 66

第 3 章 自由贸易的命运更迭 / 69

自由贸易的起起落落 / 69

美国的经济政策 / 72

新贸易保护主义	/ 76
特惠贸易协定的出现	/ 78
另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	/ 88
调整性援助?	/ 93
世界贸易组织将何去何从?	/ 95
附录:自由贸易与自由放任理论	/ 100

第4章 货币与金融 / 105

国际货币制度	/ 107
国际资本流动	/ 115
全球金融基础设施	/ 134

第5章 贫困与不平等 / 140

贫困人口调查	/ 141
收入差距	/ 149
外国援助	/ 154

第6章 道德与资本主义 / 166

引论	/ 166
分析框架	/ 167
物质信念和宇宙信念的变化	/ 170
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	/ 173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到现代美德	/ 177
现代化与西方化	/ 182
结语	/ 198

第7章 “人性化的资本主义” / 200

引论	/ 200
正义与自由	/ 201

权利	/ 204
社会家长主义与干预主义	/ 206
道德家长主义与新维多利亚主义	/ 208
资本主义与幸福	/ 211
备受抨击的公司	/ 214
结语	/ 222

第 8 章 绿党与全球混乱 / 224

引论	/ 224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 224
可持续发展	/ 230
绿党与生态帝国主义	/ 234
走向世界混乱	/ 248

第 9 章 结束语 / 252

注释	/ 258
参考文献	/ 297
译后记	/ 329

■ 前 言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时,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发展经济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¹来质疑“干预教条”(Dirigiste Dogma)。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来说,“干预教条”已经落伍了,并且受到当时热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误导。那本书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我相信它业已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并使他们确信,“干预教条”的害处是造成了世界的贫困。²

“干预教条”包含一组相互联系的信念:首先,价格机制或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被各种各样的直接政府控制措施所取代(而不仅仅是补充),否则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传统的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并未将公共政策设计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对宏观经济核算总额给予首要关注,以便制定和实施一项快速而公平的增长“策略”。第三,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施加政府限制才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最后,为了减少贫困和改善国内收入分配,需要大量与持久的政府干预。这样就能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并通过普遍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来操纵不同类型劳动者与资本的回报。《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虽然接受了矫正贫困式增长这一目标,但它表明了,为何干预

的万能药是问题所在,而非问题的解决办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对“干预教条”越来越多的批判。

随后的改革时代——既包括第三世界的改革,也包括第二世界的改革——所预示的,似乎是一个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新时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实行了经济自由化,并加入了全球化的阵营。但是,干预的冲动并未就此消失。它现在变身成为一种新干预主义,并且像过去一样,得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拥护。《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虽然历经数次修订,且在每次修订中我都力图通过各种附录使它与时俱进,然而,它在许多方面仍然过时了。因为这种新干预主义虽然是由相同的集体主义冲动所激发的,但是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之后,干预主义已经改变了它的姿态。这种新干预主义目前提出的主张是第三条道路:创造“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它不再期望用中央计划代替价格机制,而是力图调节市场经济运行,以克服所谓的“市场失灵”,同时促进各种“道德”与“社会”目标。

许多抗议者在西雅图、热那亚的大街上游行,或者是每年在阿雷格里港开会,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全球化之弊病和他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³,这些行为不过是对这种“新干预主义”的附和。他们的盛怒源于各种道德的或真实的诉求。然而,即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也并不是全球化本身使然,而是他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之全球化使然。因为催生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甚至从它在西欧中世纪盛期出现之日起,就一直饱受攻击。

几年前,我开始了一项有关“全球化与秩序”的写作计划,其目的就是反对这种新干预主义。这项写作计划旨在表明:他们的这些主张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返祖性的,要么是以沉淀在内心的、文化上不够周全的西方基督徒的特殊价值观为基础的。这项写作计划也试图展现帝国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这一初稿的许多读者——特别是戴维·亨德森与安格斯·麦迪森——都劝我将它修改为两本相互补充的著作:一本论述帝国,另一本论述有关发展的最新争论。本书就是其中的第二本,第一本书的书名是《赞美帝国》(*In Praise of Empires*) (拉尔,2004a)。这两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重叠之处。本书详细论证了为什么要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实践。

《赞美帝国》则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它远离权力政治,并相信,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全球秩序,会作为有限政府及在国内得到促进的单边自由贸易的副产品而自然出现。因此,这两本书是相互补充的:《赞美帝国》研究国际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本书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内容。这两本书都力求在一个广泛的、跨文化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当代的争论。

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一样,本书所针对的也是普通读者。因此,对专家们来说,我所试图解释清楚的各种经济学框架会显得单调乏味或过分简单。但是,如果能让感兴趣的门外汉了解那些作为当前有关全球化的公共争论之基础的问题,这样写就是必要的。此外,由于理解和反对这种新干预主义都会涉及价值问题,因此,这本书在内容上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更为宽泛,它不仅探讨较小范围内的技术专家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还探讨与政治和文化有关的问题——这也是我过去十年所关注的问题。出于这些原因,本书还会引用我的著作《贫困、平等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 A Comparative Study*) (与拉·敏合著),该书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以及我的新近著作《无意识的后果——要素禀赋、文化与政治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Unintended Consequences - 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该书涉及发展的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是,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样,我不会深入探讨各种学术争论与专业研究。它们只适合在学术论文中出现,而若在这本著作中出现,就纯粹是故弄玄虚了。因为本书的读者是那些更愿意从诸种关于发展的争论中获取问题的要点,而不是喜好变幻莫测的烟雾弹的人——不过,注释与参考文献还是会向那些有此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些指引。就像我在1985年版《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争论所探讨的观念具有公共后果。在我看来,学问的一个基本功能必须是使这些观念为普通公众所理解,这样才能使他们对利害攸关的事情作出判断。”另外,这本为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著作,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著述的。它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证据与论证之上的辩护,这种辩护比许多全球化的新近拥护者看似愿意给予

的更为有力,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我在本书中所质疑的这种新统制的一些影响。如果本书最终像《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样,“读起来更像一本小册子,而非一本常规的学术著作”,那真是件幸事。因为正如凯恩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经济学家必须让亚当·斯密独自享有四开本巨著的盛誉,而他们自己必须把握每一天,经常写作大众读物,并将小册子四处散发。如果这样做能够实现不朽的话,那也只是巧合而已。”(拉尔,2000,第 xviii 页)

我要感谢苏尔吉特·巴拉、哈罗德·德姆塞茨、斯坦利·恩格尔曼、戴维·亨德森、马茨·伦达尔、安格斯·麦迪森和拉兹恩·萨莉对我的一份关于“全球化与秩序”的初稿所作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构成了本书的一部分。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裁判员们,他们对书稿的尖锐评论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完善。最后,我要感谢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克里斯·德穆特和尼克·埃伯施塔特,他们邀请我在2002年的“温特讲座”(Wendt Lecture)做了关于“为帝国辩护”的演讲,我在这场演讲中提出了这本作为《赞美帝国》一书之补充著作的一些论点。

在各种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及一些经济学家纷纷流露出有关全球化的不和谐音中,本书所依据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即使没有被误解,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实践——我相信它仍有强大的力量将它所产生的现代化与繁荣昌盛带给世人——的重新阐述,我坚信在本书致谢中我的那些已故的古典自由主义朋友们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将看到古典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缴械投降。

迪帕克·拉尔

洛杉矶与伦敦

■ 导 论

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是正在改变着世界的一个古老进程(全球化)和一套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我们就从这套新的制度开始说起。

“资本主义”的起源

经济史学家(如理查德·托尼)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都认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了现代化,并在轰鸣的工业革命中达到鼎盛。然而,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爵士)却更愿意认为,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这个词在马克思那里的言外之意,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不必要的理解上的包袱。人们都认可的一点是:西方世界从诸多(或许是更为富裕的)古代欧亚农业文明中脱颖而出,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欧亚文明这种相对幸运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性质与时机存在着持续的争议(参见第1章)。

何为资本主义?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法国经济史学家让·贝希勒在其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中中肯地指出: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显著特征的概括,使我们无法将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各种被列举的特征

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和许多不同文化中被发现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被界定为对生产工具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与那些没有壁炉或无家可归的工薪劳动者的结合体”¹。然而,恰如贝希勒所指出的:虽然这对于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著书立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达到全盛——来说或许确实如此,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在此之前却早就出现了。

资本主义也不能等同于诸如市场、追求利润、银行、汇票及商业公司,因为这些都能在古代文明中找到踪迹。比如: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有“卡鲁姆”(Karum)……仓库与商行。进口商、出口商、供应商和银行家都在那里经营他们的业务。这些商行偶尔还具有商业裁判所的功能……亚述人关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的碑刻记录……揭示的是一个由真正的资本家所运作的完整商业网络……尽管存在着政府控制,或者至少是政府干预,但“卡鲁姆”却有自己的商业活动,并创立了一套制度使他们能够从事资本活动,例如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那些资本家活动。银行承办和批准贷款;大仓库将大批商人的货物集中在一起;银行还开办账户,且大多数交易都是通过多边账户来实现平衡的……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之际,在吾珥(Ur)及之后的拉尔萨(Larsa),资本主义似乎是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私营企业家取代了庙宇和宫廷成为有息贷款(每年33%的利率)的放贷者;他们向批发商放贷并控制着铜的进口……到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在尼普尔和巴比伦,资本家通过联合建立商行……他们接受存款、发放支票、有息放贷,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向为数众多的农业与工业企业投资,从而直接参与经济运作。(贝希勒,1975,第37—38页)

我们还可以从所有古代农业文明中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但是,那些农业文明最多将这些商业资本家看作一种必要的恶,因而,商业活动普遍得不到尊重。作为经济过程的中间人,商人并没有创造任何有形

实物,所以被看作寄生虫——他们转移农村的剩余产品以满足少数城市精英的需要,而这些产品是由那些耕地劳作以养活城里的军队和牧师的人们所生产的。专注于牟利使他们变得非常富裕,但是,他们的财富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认可或政治权力。只是在中世纪鼎盛期的欧亚大陆西部,这种情况才发生了转变。资本家们终于能够创造一种经济,使他们对利润的不断追求不仅被人们所认可,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因此,当商人和企业家最终获得了社会认可并免于政府的掠夺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便产生了。

谁是资本家?

在开始讲述这是如何及为何发生在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故事之前,我们还需要问:这些商人是谁?他们在古代农业文明中为何普遍受到鄙视?其答案也与不断发展的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最重要代表,美国,在文化上的憎恶密切相关。

第一点微不足道的原因是,这些商人资本家在农业经济中是少数群体。他们的职业必然包含承担风险和重视新鲜事物,同时也包含一些在稳定的农业共同体中并不普遍的行为特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应该已经了解并习惯了,与气候变化和其他自然界的怪现象紧密联系的周期性风险。这种习得行为通过社会风俗而固定下来(参见第6章)。求新和冒险行为会对已被社会认可的谋生方式造成威胁,但它们正是成功的资本家所必须具备的行为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曾采访过印度一家最重要工业集团的一位年迈的创始人,这些行为特征在他那里表露无遗。在我采访时,他刚刚从他的子嗣中选定了接班人,等他死后,这位继承人可以继续经营他的事业。我问他是如何作出这个选择的。他告诉我(或许是不足为信的),他在数年前给了他的每一个潜在继承人一大笔钱,让他们建立自己的事业。他们几乎都利用这个机会离开他(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只有一个孙子在一年之后垂头丧气地跑回来见他,说他在一次海外投机冒险中不幸地损失了他获得的所有钱财。这位老人于是决定他就是最合适的掌管其事业的继承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更偏向于冒险和求新行为的那些行为特质是有基因基础的。我的一位同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精

神病学研究所主任彼得·怀布罗,在其新作《美国式癫狂》(*American Mania*)中就概述了这种基因基础。他首先指出,人类迁徙是一种主要的冒险与求新行为。只有一小部分人类离开他们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居之地,开始长途跋涉,直到天涯海角,从而使得现代智人拓殖了世界。这些最早的迁徙者是谁?现在经证实,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基因信息,他们比那些留守后方的人类拥有更高比例的冒险与求新基因。既然冒险与求新“是……探险与迁徙所必需的行为……就应该在相关等位基因(D4—7 等位基因)的分布模式上有所反映。而其分布模式与我们人类的古代迁徙路径是一致的”²。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路易吉·卢卡(Luigi Luca)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一张现代智人离开他们在非洲的最初家园后的地理分布基因图。³随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陈传升博士发现⁴,在这张图上浮现出了一种与之一致的模式:“人类中那些留在他们最初家园附近的人,拥有更高比例的普通 D4—4 等位基因,以及较低比例的冒险与求新 D4—7 等位基因。”⁵

因此,人类于一万至两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迁徙,那些留下来并成为现在的非洲居民的人“与那些继续最初的迁徙之旅跨过亚洲大陆的人相比,拥有更高比例(60%至80%之间)[非迁移类型]的 D4—4 基因”。在非洲迁徙得最远的班图人中,大多数都拥有 D4—7 等位基因。在亚洲,那些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迁徙到东南亚的中国人“比那些留守后方的土著台湾人拥有更高比例的 D4—7 等位基因”。当我们人类的祖先在冰河时代跨越连接亚洲和美洲的大陆桥时,我们可以预料,那些走得最远、到达南美洲半岛的人应该拥有迁徙基因。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比如“那些涌入南半球的人——哥伦比亚人、卡里提亚纳人、苏鲁人及图库纳人部落——所携带的 D4—7 等位基因就占有数量上的优势”⁶。相比之下,日本的迁徙基因频率非常低,而且在东亚的一些地区完全没有这种基因。

我们所说的这种“迁徙”基因,也同样发现于那些表现出最极端形式的冒险与求新行为的人身上。这种基因使其携带者表现出成瘾行为,且经常会患上躁郁症(两极抑郁症)。⁷冒险与求新当然也是商人和企业家的标志。因为移民与企业家都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游走在人群的边缘。移民是一群探求者,他们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他们酷爱冒险,拥有好奇心,他们不

安分的生活方式处于行为的正态分布曲线的尾端”。可见,迁徙基因可能是十分稀有的。即使是在天启四骑士所引发的人类历史的大分裂期间,“每一百人中只有两个人在迁徙逃跑中寻求自己的拯救,而有九十八个人留守后方接受命运的安排”⁸。

因此,以前的资本家,很可能就像他们从家乡迁出的表亲一样,携带着这种稀有的迁徙基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移民共同体经常给很多的迁入国带来了商人和企业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历经了三个世纪的持续大规模移民之后,成为出类拔萃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人口中拥有较高比例的迁徙基因,这些基因的携带者倾向于求新与冒险。

但是,求新并不会培养出优秀的农民。人类在许多世纪中,一直使用石器农业技术,以应对土壤与地面的变化及气候规律。古代欧亚大陆稳固不变的农业文明对求新者与冒险家不以为然,而商人与企业家就属于这类求新者与冒险家。虽然那些资本家所从事的商业和贸易活动是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没有资格得到社会的认可。掠夺性政府周期性地劫掠商人的财富,在这些古代农业文明中应该是通行的做法。因此,虽然这些特立独行的资本家存在于所有古代欧亚文明中,但他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自由行动,而他们的求新与冒险行为最终变成了经济规范——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并导致了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的大分流。

大分流

我自己对西方崛起这个故事的讲述,收录在我的一本以俄林演讲为基础著作《无意识的后果》之中。我会在本书的第6章对该故事的部分内容进行概述。我认为,大分流要归因于11世纪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所发起的一场法律革命。他在1075年将教会置于政府之上,并通过随之而来的政教关系,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与行政基本结构,这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许多特殊制度,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那些制度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产生于扩展的商人大家族中的信任。⁹此外,他们并没有来自政府的法律保护,相反,却常常成为政府实现其掠夺目标的摇钱树。11世纪的宗教改革,通过创立教会国

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与管理体系。而且,教会国家的范围与大多数政治国家不同,它覆盖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它使得携带迁徙基因的求新与冒险的资本家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无数的陌生人一道安全地追求他们的事业。我认为,正是这一点开创了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

这种将大分流追溯到 11 世纪的做法,也十分幸运地与安格斯·麦迪森所辛苦搜集的、自基督教时代伊始的世界经济的定量证据相契合。希克斯认为,市场经济是随着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而兴起的,因为城市国家明显是从市场经济获取财政收入的——我的做法也符合这一时间架构。因为,尽管商人与市场(以“市集”和商店的形式出现)数千年来在所有欧亚农业文明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只有当商业经济的一种特殊需求——“对保护财产的需求和对契约的需求”——在一个政治体制中得到了系统满足的时候,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这些需求能得到最好满足的国家,是“统治者自己就是商人,或者被深深地卷入到贸易之中”的国家。¹⁰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就是杰出的贸易国家,因而是市场经济兴盛的温床。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书中告诉我们:“到 15 世纪末,惯常与那个含糊的术语‘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大多数现象都已经出现,包括大企业、股票和商品投机及‘复杂金融’,很多人对这些现象的反应与我们一样。”在一处脚注中,熊彼特写道:“由于金融补充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贸易十分重要,因此,法制的发展及可转让票据与‘派生’存款的出现,或许提供了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最好迹象。”¹¹但是,熊彼特所正确注解的这些在 15 世纪末处于全盛的制度,却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如哈罗德·伯尔曼在其重要著作《法律与革命》(*Law and Revolution*)中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 1075 年所发起的宗教法律革命的结果。当他宣告“让地上的王国为天上的王国服务,或成为天上王国的奴隶”时¹²,教会国家就开始了。

伯尔曼指出,在 11 世纪至 13 世纪罗马教会的庇护下,整个西方法律传统是如何起源于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对市场经济的兴起而言,最重要的是“商人法”(lex mercatoria)的形成。“教会国家为城市国家树立了榜样,教会

法也为城市法和商业法树立了榜样。”¹³伯尔曼列出了自中世纪最鼎盛的那三个世纪所出现的,与我们目前的贸易和商业现代制度的基本结构相联系的许多特征。它们包括:

可转让汇票与期票的发明;动产抵押的发明;破产法的形成——它考虑到了复杂商业信用体系的存在;提货单与其他运输单据的形成……船舶抵押贷款的发明;……用更为集体主义的包含共同所有权的合伙概念代替更为个人主义的希腊—罗马合伙概念——财产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合伙人共同处置,且一位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不会受到另一位合伙人死亡的影响;作为一种合资企业(康曼达)的股份制公司——每个投资者的责任受到其投资数量的限制;商标与专利权的发明;由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担保的公共贷款的出现;储蓄银行的发展。¹⁴

简言之,这些就是所有现代工商业经济都必需的法律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制度!

罗马教会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一个教会国家、一个法律国家,也“建立了使这种法律体系运转所需的政府制度与官僚机构:专业司法机构、财政机构、大法官法庭。这就是最早的现代政府与法律体系。它们最终为世俗政体所效仿,并在[西欧]随后的几代人中成型”¹⁵。这就是致使西方产生现代集约型经济增长,使其赶上并最终超过其他欧亚国家的大分流。只是在19世纪大英帝国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些资本主义的制度才得以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但仍是不完全的;而当前的全球化时期,完全可以看成是实现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阶段。

改变物质信念和宇宙信念

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涉及西方的物质信念(怎样才是最好的谋生方式)的改变。托尼对此作了简要的概述。他将所有西方古代欧亚文明共有的、前工业时期的农业经济对物质环境的态度,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新态度作了对比:“[前一种态度]将社会视为一个具有不同功能的、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